

郎咸平：是什么彻底摧毁了日本经济？

谢国忠：“日本病”威胁全球！

福本智之：当下的中国和二十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样！

别人在高歌起舞、飘飘欲坠，韩和元头脑清醒地
用经济史和数据来诠释“中国奇迹”背后的危机。

美中联合商会会长 林志共

中国经济 将重蹈日本覆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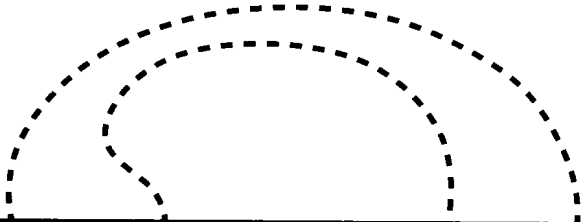
金融危机最早预言者的再次警示

这将是一本颇具争议的书，无论作者对当日的日本还是今日的中国。但对于我个人而言，这却是一本颇具洞察力和前瞻性的书。

（美）党豪斯经济研究所
詹森·布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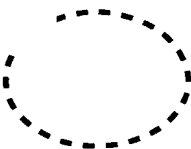
韩和元◎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国经济 将重蹈日本覆辙

金融危机最早预言者的再次警示



韩和元◎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 / 韩和元著.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044-6813-0

I. 中… II. 韩… III. 经济发展—对比研究—中国、日本 IV.F124.34 F13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5983 号

责任编辑: 王 彦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010-63033100 www.c-cbook.com

(100053 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1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 * * *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开 17 印张 190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 * * *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更换)

题记:

虽然本书的主题看上去悲观灰暗，但实际上这是一本乐观的书。

仅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和父亲、我的祖母，同时也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妹妹韩海霞女士，以及钟凡立女士和lisa。

大国兴衰的驱动力思考

价值中国网创办人 林永青

韩和元先生的新书《中国将重蹈日本覆辙？——金融危机最早预言者的再次警示》再现了战后的日本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迅速崛起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通过翔实的数据，丰富的素材以及严谨的论证解码这两个一衣带水的东方经济强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的发展奇迹。作者站在今天的战略高点，运用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将日美竞争与中美竞争两场不同时空下东西方博弈进行复盘、比较，试图在历史斑驳的踪迹中寻找通往未来的道路。这是一部非常适时和十分必要的作品，帮助并警醒我们要以最大的审慎态度去关注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战略。读完韩先生的书，掩卷遐想，脑海中不时浮现着两个问题。

一、中美博弈与日美博弈的同与不同

韩先生基于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提出“重蹈日本覆辙”这个命题。因为中日两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认为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中日两国是有共同点的。

从发展的进程看，今天的中国正在重复日本在战后创造的经济奇

迹。从1960年到1970年,日本平均经济增长率达10.9%,高居发达国家榜首;到1970年,其经济总量先后超过法国、德国,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20世纪80年代,趁美国发生“滞胀危机”,日本资金大量流入美国,大量收购美国的企业、工厂、房地产等实物资产,美国人惊呼日本人要“购买美国”;相似的,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一直保持9%左右的增长率,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三,预计2010年将超越日本从而在世界上居二望一。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在全球首先全面复苏,中国商界和媒体界甚至有人适当或不适当地喊出了“抄底华尔街”的口号,历史何其相似!

从发展的策略看,中日经济发展战略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都偏向于国家大力干预经济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或类国家资本主义倾向(参见学者何新等人的作品),都采用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韩和元先生在书中,虽然对于出口贸易总量占GDP总量的比率这一指标是不是有意义的指标,做出了论据充分的讨论,但我们还是不可低估“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在过去三十年,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从发展面临的国内和国际问题看,今天的中国也面临着20世纪90年代日本遇到的类似的国内外问题。例如国内资产泡沫化,大量资本流入股市、房市等领域,收入差距拉大、内需不振,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优势难以为继;国外面临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货币干预政策;中国甚至还面临分配不公的特殊历史问题。

但是这两场博弈毕竟是不同时空背景下发生的,因为中国和日本两国的经济总量和世界影响的重要程度,可以把它们视为东方向西方发起的两次挑战。而日本第一次挑战失败的先例并不必然会成为中国第二次挑战失败的阴影,因为从所处的时代、国际环境和双方的力量对比而言,中日双方都没有可比性可言,从学理上和实证论据上讨论,“重蹈日本覆辙”也许是个假命题;以审慎乐观的态度预测中国下一个三十年的发展,我们也希望事情能够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从中日两国各自所处时代区分,日美博弈正酣时,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全面逐步压制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最后导致苏东联盟土崩瓦解的时候。冷战氛围依然浓厚,美国在西方阵营的霸主地位不可动摇,西欧、日本等小兄弟国家还要仰仗美国的军事保护,经济上虽然互有竞争,但毕竟不敢完全放开手脚。而中美竞争的时代背景是在“超级大国的两极体系崩溃”、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加快发展的时代,经历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美国的实力有所削弱,与西方盟友的关系严重受损。尤其是金融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大打折扣,建立单极世界的新帝国主义梦想已经搁浅。世界已经完成了从两极世界向多极世界的分裂重组。

从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看,日本在政治上还没有解决战败国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被限制在美日政治军事同盟的框架内,在国际上没有政治话语权和对外战争权,难以作为政治军事力量的一极。而中国已经作为世界政治的重要一极频频现身国际舞台,在发展中国家有深厚的基础。经济上,不管是国土面积、人口规模、市场容量还是资源储量都很难与美国相比,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很严重,经济发展的外部性较脆弱。可以说日本是搭美国的便车,而中美关系更多是互补,美国发展高端服务业,中国发展高端制造业,短期内这种分工较为明晰,互补性也较强,即使国际市场发生逆转,通过依靠庞大的国内市场依然可以化解危机。

从国际环境来看,日美博弈的时代正处于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初期,互联网、通信、交通运输技术较今天仍然很落后,国与国之间的依赖程度还没有像今天这么密切,因此日美博弈竞争多于合作。今天的世界,全球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国与国之间空间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樊篱,人类也面临着气候变暖、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传染病、恐怖主义等共同问题。它们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军事、经济贸易而成为世界政治的主要议题。因此,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无论

从意愿上还是从现实主义立场看,更倾向于寻找双赢,而不是简单地一方吃掉另一方。因此,美国并没有实力,从长远利益来看,也没有必要搞垮中国。

有一项重要的例证:就是当年美日在金融和货币体系领域的博弈——日本最近10~15年以来的经济衰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直接压迫下的日元升值的结果。而21世纪前10~15年的今天,中国的人民币汇率虽然也有很大的升值压力,但是,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也不可能达到当年日元升值的程度和美国所单方面企望的后果。中国总理温家宝明确表示:任何一个大国,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不能干涉和胁迫其他国家的货币汇率。这也释放出一种信号,表达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上的决心,当然,更重要的是背后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信心。

二、大国兴衰的终极逻辑是什么？

上述分析绝没有否定韩先生的忧患意识,及其如何评价都不为过的重要性,相反,我们应该从以日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镜鉴,为中国今后的发展做更好的思考。书中缜密细致的分析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韩先生借鉴了很多知名学者的论点,引用了很多的数据,其治学的严谨和视野的开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解码日本经济奇迹为例,韩先生详解了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池田勇人的收入倍增计划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收购美国”的历史过程,列举了“掠夺说”、美国扶持说、都留重人说等观点,通过阅读,我们对日本的崛起有了更为感性的认识。

不仅如此,作者的分析不满足于表面现象的分析,而是细致到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具体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美国对日改造政策、扶植政策为日本经济发展扫除障碍,此“时”也;美国把日本作为遏止苏

联和中国的太平洋岛链的重要一环,朝鲜和越南两场战争的特需供应刺激日本经济增长,日本也利用岛国的海港之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此“地”也;日本人比较重视储蓄,为经济发展积累了充裕资金,日本人较为重视教育,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丰富,日本人有深重的危机意识,全民拼命工作,又实施了正确的出口导向型政策,此“人”也。

韩先生最后引用罗伯特·J·希勒博士的话做结尾,世界上绝大多数事件,我们都找不到简单的起因;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也一直强调,“历史一定是综合历史的结果”;经济学家哈耶克甚至强调,“偶然性也在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每个事件都是由众多的因素堆积起来的。

但是,不妨借鉴一下实用主义的工具立场,我还是倾向于认为这一系列的因素背后一定有它的最重要的终极动力或者终极逻辑,也方便从实践维度提出一个操作性的假说。韩先生在书中已经提及,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总结,在这里我提出来作为本书的一个补充吧。——财富增长的终极逻辑是知识的创造!

希望每个读者都能从本书中体会到韩和元先生想要传达的主旨,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覆辙?我们如何去看待隔壁岛国上的邻居?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从“中国奇迹”这个梦幻的泡泡中醒来?

自序

2008年注定将是一个属于中国的年份,多年后蓦然回首,一些印象必将注定或多或少地带有中国的印记而浮现在人们的记忆中。正是这一年,一场60年一遇的经济危机从美国华尔街悄然发端,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证券……这些百年巨头在曼哈顿的街头轰然倒塌,所腾起的恐慌犹如原子弹的蘑菇云,笼罩着整个欧美世界,金融危机肆虐下的世界经济陷入了全面衰退。

也正是这一年,一场罕见的冰冻灾害和一场同样罕见的大地震降临到中国人身上。但这个有着5000年文明的民族,带着剧烈的伤痛,在这一年的8月8日向全世界奉献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为恢弘壮观的奥运盛会。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作为全球唯一保持增长的经济体,完成了历史上的又一次跨越——经济总量突破30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份额达到7.3%,稳居世界第三位。

再没有哪个时代的中国像今天这样受到世界的关注:无论是三十年不变的经济高速增长,还是金融危机中奇迹般地率先回暖,都让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国家充满了探究的热情,他们想弄清中国的发展动力,更希望中国能够成为抵御风暴的中流砥柱,引领世界走出危机。

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这30年里,中国以令人瞩目的速度崛起。中国的GDP以不可遏制的速度增长,在10%左右徘徊的惊喜数字,让很多国家的经济学家大跌眼镜——中国的确缔造了一个世界经济的奇迹。就经济增长速度而言,中国在世界上已经领先了

三个十年。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由 1979 年的 1.9% 增加到 2009 年的 7.3%，中国经济的总量则很可能在 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

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的时候，思考中国高速增长的奇迹能否延续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假如中国能够像过去三十年那样，仍然享有 9% 以上的年增长率，同时考虑到世界主要货币币值变动的因素，那么在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结束不久，中国的经济总量便有可能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便会成为改写世界经济版图的一个决定性的十年。

哈耶克曾经说过：“在人们对繁荣乐观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对未来给予恐惧”。对于这种乐观的态度，我们同样应该抱有这种敬畏，我们甚而认为那种乐观的态度甚至有些放任且盲目的味道。任何只要经历过日本泡沫经济和 2001 年至 2008 年经济起落的人，都有理由去质疑那种想法。

当然他们的观点也许在一个时间段里是对的，但正如罗伯特·J·希勒教授曾经在他的那本伟大的《非理性繁荣》里为遏制资本市场的非理性泡沫经济而做的建议那样，在有的时候为维护资本市场的长期稳定，必要的针锋相对也是有必要的。这种道理又何尝不能用到更为广泛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呢？

所幸的是当前尚未出现那种极端乐观的情绪一面倒的现象，对于那种极端乐观情绪的批评甚至针锋相对的言论经常见诸于各种媒介。虽然这种观点或许并不见得融于主流意识，也或许并不见得正确，但我们期待的是，人们对于这种泼出来的冷水应该采取一种更为包容的态度。正如哈耶克所说的：“正是源自人们不同经验的不同观念之间的争论和相互批评，被认为推动了对真理的发现。”

对于中国经济在危机中的表现，那些只要对日本泡沫经济的起落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感到后怕而绝对不是沾沾自喜的。

20 世纪 80 年代对于欧美来说,是一个糟糕的年代。70 年代末期,美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滞胀,到里根总统上台的 1981 年,当时的通货膨胀率高达 10.3%,而最优惠利率更是高达 20.5%。但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日本却根本没有受到出口市场疲软的致命打击,其根本原因在于,其经常项目盈余和强劲的财政状况为宏观政策提供了回旋的余地,使得任何形式的经济放缓严格来讲都只是暂时现象。为此西方学者惊呼日本将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而控制整个世界,日本世界第一。

但表象绝不代表事实,在那些预言家为日本做出乐观预测时,欧美所遭遇到的那场危机并不是让日本毫发无损,在危机中轻松地就返回了正轨的日本经济,是并不触及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创新的复苏和繁荣。也正因此,从事后角度来分析,反倒正是这场危机事实上加剧了日本的结构性问题,当时光鲜的表面却在为后来的另一场严重得多的灾难埋下伏笔。

日本陷入了乐观预测悖论的深渊,1991 年后其经济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停滞,日本人把它称为“失落的十年”。其间,GDP 增长率大幅下降,且在短期内几起几伏,还出现了负增长的财年。如 1990 年 GDP 增长率达 5.1%,1993 年下降到 0.3%,其后除 1996 年增长 5% 外,其余年份增幅在 1.6% 以下,1998 年为 -2.5%,2001 年为 -0.5%。

中国今天正在创造着经济上的奇迹,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就如同现在还深陷在失落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的日本一样。我们自己亲身所感触到的,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之大、矛盾之多、问题之复杂亦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虽已见底回升,但世界经济仍很虚弱,出口不畅,这再一次地将固有的产业结构的矛盾摆在了我们面前,扩大内需却又何其的难。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社会分配机制严重失衡的阶段。然而更为紧要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却在日趋恶化,资源和地球空间本身的有限性已经不容许我们再像过去那样放纵自我了。唯物主义史观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我们亦无可否认,

有些要素过去帮助我们成功过,但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出现了,那么我们就必须反思。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现在留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如今亦在深享着当日欧美国家所给予日本的“礼遇”,甚而可以说,当前整个世界,无论是崇拜还是害怕,整个世界都在高度地关注着我们这个国家,就如同当日整个世界对日本所施与的一样。但正与我们所能够见到的,日本正是在这种“注目礼”中,渐渐地陷入了乐观预言的悖论里。那么我们又会不会像日本那样,陷入那些并没有洞察力的美国人的乐观预测后的悖论怪圈呢?

如果大家仅仅通过题目和书名,就轻率地认定我在本书里预备表达的是,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诸条件已经消失,中国经济将陷入“停滞膨胀”的深渊,那么我可以说的是,这种论调是大错特错的。但在这本书里我想表达的是,当前中国经济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的关头倒也是事实。

中国确实应该对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做出深刻的检讨和分析,并对此作出相应的调整。正如同我预备在书里跟大家探讨的那样,当前的这场危机昭示给我们的是,这绝不是一次正常的经济周期,这次的危机或许意味着的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需要的不是回到过去,因为我们有限的地球,已经不容许我们再回去了。

虽然本书的主题看上去悲观灰暗,但实际上这是一本乐观的书。就像邓小平在 1979 年那样,我们只有深刻反思过去所遇到的问题,才能知道如何改弦易辙,从而走上成功之路。

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我们需要抛弃的是那些不能够在新变化的生态下,可以予以继续保留的传统的甚至有害的价值观;需要的是去探寻一种,能够适应于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价值观;需要的是一种根本性的系统重建。在这个转折的关头,中国乃至全球的社会体系都需要做出重大调整。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比以往更合理的基础上重建我们新的价值体系和新的发展模式。这不是所谓的“回归正常”,因为以前那

种所谓的“正常”不可持续。

人云：文如其人，确实是如此的。在这本书里，我的劣根性再次暴露无遗，那就是我的好斗、好于论争。对外我常欢喜说起哈耶克的观点：“正是源自人们不同经验的不同观念之间的争论和相互批评，被认为推动了对真理的发现，或者说，至少达到了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最接近真理的程度”来做大旗，但那充其量不过是自己为掩盖自身的劣根性而找的一块遮羞布而已。但有一点也是必须自我供认的，那就是我喜欢与具有不同经验、不同观念的人之间开展争论和相互批评，至于推动对它的发现也自然是我的能力所不能够企及的。

但在这里我还是应该感谢那些具有与我完全不同的经历、背景和观点，而又不吝赐教与我的人，他们分别是来自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奥贝尔塔大学的费尔南多·费雷罗、英国伦敦城市大学的爱伦、美国哈佛大学的瑞德、中国同济大学的秦海华。他们之中不仅有研究生也有研究生的导师，但正是因为跟他们的论争使我受益良多，也正是他们的评论使我纠正了过往很多认识上的偏颇。应该值得感谢的、与我曾有过论争的人还有：来自芝加哥的山姆·弗兰克先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管理科学研究所的崔长林先生……感谢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女人——Lisa，这个量子理论的信徒，正是因为她与我的争辩，终于纠正了我只信艾略特的波浪理论的偏颇。

在此我还应该感谢的是美国党豪斯经济研究所全体同人、美国卡蒂弗贾尼丝韩森联合投资顾问公司研究部全体同人、师从于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洗蒙·康威莫里斯教授的剑桥大学生物学博士苏珊女士；感谢中国人保资产管理公司研究所的王家春总经理、价值中国网的创始人兼 CEO 林永青先生；感谢美中联合商会会长林志共博士；感谢汉斯·利伯曼、艾森·金德尔、李·甫里嘉、约翰逊·布卢、罗恩·桑尼、乔·罗斯、安·拉赛、提蒙·多尔曼、埃文·彭罗斯、盖瑞·卡特、史迪夫·魏特、佩吉·格罗许、丹·克罗克、吉姆·伯拉穆、保罗·马修斯

……正是基于与他们的密切的联系和往来,让我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学到了很多我以前所不知道的知识,这种交往是极具价值的,感谢他们与我分享知识和经验。在我写作过程中,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建议和看法。在这些朋友中很多人是不能够认同我的观点的,也正如同我不能够认同他们的观点一样,但正是这种观念的冲突,总是激发我的灵感。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观念不同,但却长期保持良好的友谊,他们总是有求必应,我欠他们许多的情。

另外我的朋友、原托普集团年青的首席信息官王清铨先生在我这本书准备出版时提供了许多帮助;感谢我的老师谭士珍先生,我是不擅写书的,语法和标点总让我自卑,感谢这位向我们呈现了袁隆平先生一生的著名作家给我的莫大鼓励,使我有勇气来写下一些感谢和感慨。

我也应该感谢我的家人:感谢我的妻子钟凡立女士,她是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她看了我的初稿,并给我写下了无数的评语,使本书改善甚多;感谢我的祖母韩黄元秀,她教会了我自强不息,感谢她的茹苦含辛。我在5岁的时候就失怙了,是她将我拉扯大的,正如同我的同学谢海波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是这位伟大的女性,或许我只能待在湘西做一个并不合格的农民;感谢我的叔叔韩瑞兵、韩瑞文先生,特别是仅仅长我两岁的么叔韩瑞文先生;感谢我的妹妹韩海霞女士,我今天所拥有的知识完全是建立在他们的付出之上的,如果不是因为我或许他们能够再多接受几年教育,或许他们更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这让我一直不能释怀,事实上他们都比我聪明。

特定于本书,最后最应该感谢的人还有磨铁公司的卢国俊先生和王雪小姐。如果我的这本书,还不至于一无是处,那么读者们首先应该记住的就是上述我感谢过的这些人,因为正是他们,使得我的生命非常充实,并能够致力于研究。

韩和元(Pierre A Hanson)

引言:中国经济真可幸免于危机之外?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曾在金融危机肆虐的 2008 年的 11 月份撰文称:正在席卷主要工业化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已经对这些国家的金融系统造成了巨大破坏。但中国却可以幸免于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他基于的理由是:

第一,中国已成为储蓄的净输出国,这从最近几年稳定的、数量可观的经常账户顺差就可见一斑。因此,作为一个经济整体,其杠杆化效应大大低于世界其他地方,这反映在极低的外债水平上。

第二,持续性经常账户顺差所造成的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使得国内银行系统的流动性仍然泛滥。

第三,归功于对资本账户的控制,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是中国中央银行对外进行高质量和高流动性的证券投资。

第四,各经济部门(如家庭、企业和政府)之间的金融联系主要是以传统的商业银行为媒介,因此非常简单和清晰,特别是与美国高度证券化的金融市场相比。

第五,家庭和政府的资产负债状况很健康。家庭和政府的债务水平低到分别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3% 和 33%。此外,银行资本充足,流动性泛滥,贷/存款比率只有 65%,是除日本之外的亚洲地区最低的国家之一。

王庆的上述观点,事实上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受到很多人的认同,《日本新华侨报》曾刊文认为,自金融海啸

爆发以来,“世界看中国”、“中国救世界”的论调不断被媒体抛出,甚至有报道说美国效仿“中国特色”。中国一些媒体对此更是绘声绘色,乐此不疲。单看这种“西方停滞不前、中国一枝独秀”的报道无疑透露着几分自我陶醉的味儿,似乎都在验证当今世界“西方不亮东方亮”。2009年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巴伯在访问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时,所提的一个观点就是一个例证。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9年初访问欧洲时,曾在伦敦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巴伯的专访。在访谈中巴伯这样问温家宝:很多人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可是现在他们恐怕要转变观点。很多人说只有中国才能拯救资本主义。

事实上,持有巴伯这样观点的人,在整个西方世界应该不在少数。全景网的编辑陆泽洪先生的一篇文章或许也能够说明这一问题,这篇标题为《还有谁能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西方国家重新点燃希望?恐怕只有中国了》的文章这样写道:

当传闻——仅仅是传闻——中国将宣布刺激经济的新措施时,包括美股在内的全球股市随即扭转了连日以来的跌势。道琼斯指数当天劲升超过2%,一举终结了连续五个交易日以来的大跌;而日本日经指数更在明确该传闻仅仅是谣言之后,仍不屈不挠地再升近2%。

与此相对的是,次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同寻常地怂恿投资者,称现在已经是买入美股的好时机时,道琼斯指数反而应声创下十二年来的新低,折射出美国总统的号召力甚至还不如一则关于中国的谣言。想想欧美的资本大鳄正跟在中国小股民的屁股后面跑,这是何等值得骄傲的事情啊!

蓦然回首王庆先生仿佛是正确的,在这次大危机中,中国的表现让世人为之震撼。而同时国内的民族情绪亦异常的高涨。抄底海外的呼声一日高过一日,人们的逻辑似乎无可反驳:尽管西方世界在股市崩盘后仍旧在挣扎,但中国经济显然轻松地就返回了正轨。中国正预备凭